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六〇期 ——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7d)

【不堪回首】	往事如烟	高 山
【痛定思痛】	新中国永远的痛楚——追忆文革中儿童所承载的历史细节	王俊生
【难忘岁月】	文革十年——在华北电力设计院的经历	卜 毅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不堪回首】

往事如烟

• 高 山 •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文革是血，文革是泪，文革葬送了一代人的青春梦想。

往事如烟，从何说起？

(一)

那是一九六六年，我即将初中毕业报考高中。

从六五年开始，学校里就不断组织学习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学生可以不上课，考试可以交白卷，要搞教育改革，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那时，我父亲是某师范学院副院长，我母亲是

该学院附属中学党支部书记。附中是市里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我在班上和年级里成绩拔尖。我知道如何证明三点共线，九点共圆，但搞不懂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是什么道理，只觉得它对成绩好出身不好的人极不公平，心里对他们很同情。

六六年五月。梧桐花开，花絮飞扬，空气里充满了春天的潮湿气息。此时，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早已开始，北京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猛烈批判，学校里的政治学习越来越多。刚开始，报纸上称为学术讨论。不久，学术讨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彭罗陆杨倒台，人们开始躁动不安，暴风雨即将来临。

六六年六月三日。空气还是那么潮湿闷热，枝枝花和茉莉正在盛开。上午学校正常上课。下午两点，附中全体教师学生集队去听中共中央重要文件传达。当我随队来到师范学院大礼堂，大礼堂外朱红色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走近一看，矛头全指我父亲：“X X X要把这场学术讨论引向何方？”“深入批判X X X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傻了眼。顿时，全班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那时，我不满十六岁。

（二）

一九六四年我父亲由G省教育厅调任某师范学院副院长，母亲由省城市教育局调任该院附中党支部书记，我也从省城一所重点中学转学到附中。那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我一心只想学好数理化，将来上一流大学。我喜欢打乒乓球，更喜欢踢足球，是校足球队的后卫。

十四岁青春开始悸动，我暗中恋上了班上一位女同学。她瓜子脸，前额飘着刘海，一笑脸上两小酒窝。她的性格活泼，经常和同座的男同学（班长）调笑打闹。班长个子高，很英俊。开始我只觉得她很美，后来成了朝思暮想，心中的暗恋却不敢表露半分。我坐在后排，目睹班长扭她的脸蛋，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醋意。我性格腼腆，越是喜欢她，越不敢盯著看她。每当目光相对，我赶紧扭头别处，深怕眼光会暴露内心的秘密。

火红的年代渐渐来临。六三年学雷锋的高潮过去了，开始学王杰，学麦贤得，学解放军。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也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开始了，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开始了，劳动竞赛开始了。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去植树造林，支援秋收双抢，修水渠，挑塘泥。挑一天塘泥下来，那个累，第二天上课都打磕睡。累归累，还得咬紧牙关，学习英雄。

十四岁的暗恋逐渐退热，十五岁的青春继续悸动。在义务劳动中，我喜欢上隔壁班一位瓜子脸蛋瘦小个子的女同学。每当她推着小车经过，仿佛象三月的桃花在雾中出现。我甚至渴望去义务劳动了，为的是能在工地上看她一眼。我没跟她说过一句话，一直把这段思念埋在心里。后来我才知道：她父亲是解放军某步兵学校付校长。文革初期她参了军，从此再没见面。

团组织开始发展团员了。我没想过要入团，一是觉得团章里写的那些条条要求太高，我永远无法做到；二是入团要经常汇报思想，我不喜欢汇报思想。也许因为我母亲是附中党支部书记，也许由于我的学习优秀，班主任让班上团支部找我谈话，让我递交入团申请。回想起小学时的班主任让我领队参加少先队六一游行，我拒绝，惹得班主任动了怒。这一次我不敢故技重演，还是顺水推舟吧。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共青团员。不久，在班主任授意下，我被选为班团支部书记。半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

我至今忘不了文革爆发的一些前奏：

六三年：学雷锋，随之而来学解放军，学毛著，全国统一思想。洪湖水，浪打浪，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六四年：大型革命历史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红梅赞，千里冰霜脚下踩，一片丹心向阳开；原子弹爆炸，举国欢呼热血沸腾；抗美援朝，打败美国侵略者；英雄儿女，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六五年：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军垦战歌，边疆处处赛江南；长征组歌，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想念毛泽东？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来了。

（三）

师范学院第一批大字报矛头直指我父亲，父亲靠边站，由此因祸得福躲过一劫。紧接着，大字报的矛头转向了院长和党委书记。时任师范学院院长和夫人是当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出身，夫人六四年病逝。大字报气势汹汹地指责他为黑帮分子，并质问他与陆定一成仿吾的关系。

继师范学院大字报后，附中也出现大字报，矛头直指我母亲。母亲沉不住气，公布了一名写大字报教师的历史档案，引起了教师们的愤怒。省市派出的工作组很快进驻了师院和附中，师院院长被停职反省，我母亲也被停职反省。

工作组进校不久，北京串联学生接踵而至。紧接着，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十六条。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断言：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边；决定宣布：要放手发动群众。

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天机暂时还不能泄露。

革命风暴变幻无常。工作组刚代表党处分了一些院校领导，很快又变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凶手，从各学校灰溜溜撤出。学校停课闹革命，人们开始在校园里辩论，在大街上辩论，冲出校门，杀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被停职反省的师院院长，夫人去世后身体一直欠佳。一天晚上他多服了些安眠药撒手而去。他留下四个孩子，老大刚进大学，老么刚上小学。往日趾高气扬的红五类，一下子成了没爹没娘的黑帮子女。两个月后学院分成两派。两派的头头为印证院长是否自绝于党和人民，把尸体又挖了起来，开肠破肚，进行化验。结果死亡时间太长，医生无法作结论。

附中。我母亲停职反省后，学校组织批斗会，我眼看着母亲被批斗，革命派逼着我与父母划清界限。母亲承认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拒不认罪。随着全市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被揪出来，革命群众将这些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挂牌游街示众，母亲也在其中。之后，母亲每

星期被罚扫学校厕所，直到后来两派武斗，把我母亲遗忘。

父亲也少不了被批斗。有一次在批斗中他被砖头砸在腰部，回家后擦了两星期云香精。父亲的检讨一份接着一份，每次都因不深刻而重写，写好后让我帮他抄誉。看著父亲从中央文件和报纸上东拼西凑他的检讨，我真不知道这检讨何时才能通过。

（四）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首次在北京天安门检阅首都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受毛主席接见，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之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大串联开始了。

秉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国各地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接待串联的学生。红卫兵在大串联中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免费食宿。

听到这一消息，我动了心，这可是免费游山玩水的好机会，不去白不去。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这么说，得说是革命串联。

我和几个同学相约，由学校出具学生证明，到市委接待站登记免费车票。我问母亲要了几十元钱，带上一床毛毯和几件换洗衣服，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那时串联刚开始，车站秩序正常，火车上人不挤。

八月三十一日晚，我们到达北京车站，北京车站气派宏伟，大钟正敲打着音乐。车站外面，多个高音喇叭竞相广播：“今天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首都红卫兵。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小将们，请你们回去就地闹个命，不要在北京停留。”“革命的杀回老家去，不革命的滚蛋！”

我们没有滚蛋，把毛毯铺在车站候车室地上，几个人挤在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前往清华大学抄大字报。抄了两天大字报，革命串联的任务基本完成，到此一游开始。我去了北海公园，颐和园，动物园，天坛，前门，天安门广场，还逛了西单商场。想去故宫，故宫不开放。

北京的街上，我几次看见一伙伙身穿旧军装，腰束大皮带，臂戴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套的男男女女骑着自行车威风凛凛飞驰而过。

初秋的天空晴朗，天色蔚蓝。大街的商店和摊位上各种水果琳琅满目，葡萄，苹果，京白梨，鸭梨，西瓜，香瓜。到了夜里，自来水凉嗖嗖的，沁人心肺。我尽情地享受了一番葡萄和各种瓜果。

在北京车站睡了几个晚上地铺后，同伴们开始各奔东西。我余兴未尽，一人前往山东济南，抄了两张大字报后接着就饱餐山东鸭梨。之后，我前往南京参观了雨花台和总统府。

终于，口袋里的钱花光了，我回家了。

两个月后的深秋初冬，我又一次乘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此时，铁路秩序已经混乱，火车上座位下面和行李架上都是人。到北京后，我住在东直门外一个新建的工人新村，每天到接待站

领两个窝窝头和一瓢大白菜汤，等待毛主席第六次接见。

这一天终于到来。清晨四时，我把鞋带打成死疙瘩，鞋跟别上别针，防止鞋子在拥挤中被踩落。一大早，学生们被汽车从四面八方运送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人群排成一个个方块，一望无边。十点左右，广场上奏起了东方红。“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湃的人流朝着金水桥方向拥挤挪动，然后由东西长安街分泄。拥挤中不断有人鞋子被踩落，发出尖叫。我死死拽住我的挎包，随着人流朝前涌。终于，我到了金水桥前离天安门城楼三十公尺的地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穿着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居高临下，偶尔向下面的人挥挥手。四周的人如醉如痴，拼命喊叫。我没有激动的感觉，只是随着人流移动，尽力保持身体平衡，以免被挤倒，同时，眼睛盯着天安门城楼。

这就是我们的红太阳？与天安门城楼的肖像相比，他身躯肥胖，满脸是肉，眼皮浮肿，看不出一点慈祥。我找不到言辞来形容这种反差，心中一阵失落。

终于，我随人流出了东长安街。前面有个身穿绿军装的女红卫兵一拐一拐地走着，边走边用手抹着泪水。她一只脚穿着解放鞋，另一只脚上只穿着袜子。我忍不住纳闷：不知她这泪水，是为见到红太阳而落，还是为脚疼而流？

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天安门广场，再看一眼这昨天曾是红海洋的地方。广场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三五成堆的鞋子。

（五）

六六年在北京见到了红太阳后，我接着去了武汉，长沙，广州。回到家，父亲仍在向革命师生们检讨，母亲仍在扫厕所。由于父母的原因，以往的同学朋友渐渐疏远，我在家当起了逍遥派。

我买了一把二胡和一本二胡入门指导，开始打发时间。我从基本音阶把位和指法开始练习，学拉一些简单歌曲。渐渐地，我学会了良宵，赛马，山村变了样，赶集，三门峡畅想曲，还有江河水。我把世态炎凉和人间的平不平倾注在如泣如诉的琴声中。

革命造反的火焰越烧越烈。人们分成了两派，许多家庭也分成了两派。我家住的院子里，左邻右舍有付书记付院长，还有教授讲师处长等。其中一位处长，老婆原为家庭妇女，如今她戴上了红袖套，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过去他们见到我父母，左一声院长右一声书记的，现在见面则板起了脸。他们有三儿一女，大儿子与我同年，二儿子比我小两岁，据说患过脑膜炎。此刻，他脑膜炎后遗症并发。他一见到我母亲和我们几兄妹，就高呼“打倒XXX”（指我母亲），还不断地朝我们家的窗户扔石头。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养了鸡。自从我父母被批斗后，鸡下的蛋常常不翼而飞；鸡也隔三岔五莫名其妙死亡。有一次，一只下蛋的母鸡突然死去，开肚破肠后，发现鸡的肛门竟被糞土和图钉堵塞。

一天，我坐在凉台上练习二胡，脑膜炎出现了。他先大喊“打倒XXX”，我没理他，于是他开始向凉台扔石头。我一出去，他立即躲入隔壁一家支持造反派的付书记家里。这么折腾了几次，我终于忍无可忍。我盯着那家人门口，门一开，我冲了进去，抡起拳头对脑膜炎一顿猛揍。突然，我被人从后面死死抱住，他的哥哥不声不响地来增援了。脑膜炎愣过神来，从桌上抓起

一把铁锤朝我猛锤，接着又掏出一把小刀朝我乱扎。小刀扎在我背上和手臂上，有一刀划破了我右边太阳穴，鲜血顿时迷住了我的右眼。

要论单打独斗，脑膜炎的哥哥决非我对手。这时被他从背后抱住，我一时无从松开。当其他人拼死把他哥哥拉开，那兔崽子已一溜烟躲回了家。我当时没有感觉疼痛，只有一腔怒火，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我留意着这俩兄弟的行踪。一天中午，那兔崽子在大操场上玩，哥哥不在近旁。见此机会，我立即冲上前抡拳朝他揍去。挨了几拳后，他飞快地往家逃跑，一溜烟没了踪影。下午，兔崽子的父亲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向我父亲告状，我父亲低声地赔不是。我一进屋，兔崽子的父亲立即指着我的鼻子咬牙切齿道：“你，你，你阶级报复！”那架势，恨不得把我一口吞下。

我也狠狠地盯着他。此刻如果他敢动手，我也将一拳过去。

从那以后，兔崽子再也不敢在我面前喊口号扔石头，哪怕他哥哥就在近旁。我们家的鸡也恢复了安宁。

（六）

一九六七年，全国各地分成两大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振天动地的口号声中，两派起初是磨擦，后来发展成武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在那百般无奈的岁月里，我认识了几个高三的同学。我们常常在一起下棋打扑克，一起爬山，一起发牢骚，很快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当时我们都是逍遥派。

我所在的G市，造反派是多数派，占压倒优势。一天，在一场辩论中，一名持保守观点的小学教师被造反派扔到湖里。他挣扎着游到岸边，又被扔了下去。再挣扎游到岸边，再被扔下去。后来，他被捅了两刀，沉下湖底。

有一天我去学校还书，被班上的造反派同学叫住，问我是否支持他们的观点。我当时倾向于保守派，直言了几句。几分钟后，来了几个高中部的造反派，把我带到他们的战斗队队部。一个家伙喝令我跪下，我不跪，他绕到我背后，往我腿部使劲一踹，把我踢倒在地，然后劈头劈脸一顿拳头。这一顿拳头，把我打成了保守派。

两派冲突不断升级，双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初始抢占据点，高音喇叭对骂；而后抢枪，文攻武卫，夷平对方。野战军支持造反派，地方部队和空军支持保守派。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高射机枪用上了，定向炸药包用上了，飞机上拆下的机关炮用上了，抗美援朝弹药物资也给抢了。多少楼房被夷为平地，多少生命化为灰烬。

武斗开始后，造反派很快占领了整个市区，保守派被迫退守南北两翼。师范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家里很不安全。我父母身背走资派罪名不敢乱说乱动，只好让人带着弟弟妹妹去省城避难，我也离家出走。我爬了一趟又一趟的铁路货车，也到了省城。当时省城的两派也在武斗，高音喇叭和枪炮声演奏著文革的乐章，好在还不是全市范围。我很想弄一支枪，跟着保守派去抢了一次枪，那是一个地方武装部的军械库。武装部对抢枪早有准备，把枪身和枪栓分别收藏，结果我只抢到了十几个枪栓和一箱手榴弹。

在省城漂流了两个月，我好不容易打听到有辆汽车开往L市。跟司机联络后，我带上这箱

手榴弹上了车，打算先到L市再从那儿回G市。汽车刚出城，有人把我们当成造反派通报了沿途的保守派关卡。到达第一个关卡，人与车被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扣押。盘查了半天，弄清楚不是造反派后，我的一箱手榴弹被没收，人放行。为了避开造反派地盘，我们这辆车盘山绕岭地通过了重重关卡，三天三夜后终于到达L市。从L市我再次爬铁路货车回到G市。

回到G市我立即打听我朋友的情况，听到的却是晴天霹雳：我那两位朋友死了！正当二十岁的青春年华！那一天，保守派两辆汽车由南往北。一位朋友想去北边看望他初恋中的高一女友，另一位陪同他一起上了第一辆车。汽车中途迂到伏击。当第一辆汽车被打翻时，他俩跳车逃跑。跳车后一个跑出二十多米被子弹打碎了后脑梢，一个伤倒在地被补了两刺刀，全车无一生还。第二辆车见势不妙，立即调头，得以逃脱。

听到这个噩耗，我上了武斗前线。

（七）

G市武斗初期，保守派势单力薄，只占领了市内少数几个据点。起初双方使用长矛棍棒和匕首。抢枪之后，保守派得到地方部队和空军支持，造反派得到野战军支持，武器装备占很大优势。当造反派使用定向炸药包后，保守派市内的据点被夷平，被迫退守南北两翼。保守派调动各县武装民兵增援，农村包围城市。造反派抢先占领了市郊的山头，保卫后方。随后，双方在市郊争夺制高点，开展了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G市的山全是石山，怪石林立，市郊最高的山是西山主峰，从这里可以俯瞰市区，控制山下的南北通道。西山主峰山势陡峻，易守难攻，根本用不着工事。另一方面，石山对攻守双方都有个要命的地方：躲在石头后面，子弹打不着人，爆起的碎石片却很容易伤人。当时，守山的造反派都是些年轻的中学生。

武装民兵们封锁了上山的通道。他们白天不进攻，到了无月之夜，就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往山头摸去，一有动静就开枪扔手榴弹，天亮前又撤下来。这样折腾了几夜，山上造反派学生弹尽粮绝。他们象狼牙山五壮士一样，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往山下跳。无独有偶，一名幸存的跳山学生后来插队时恰巧到了一名昔日攻山武装民兵所在的生产队。

我到西山前线时，学生跳山事件已过，主峰制高点再次被造反派占领。我被分到离西山不远的造纸厂阵地，这儿大约有一个班的人。我们轮流在造纸厂旁边的矮山上监视西山方向的动态，其余时间就打扑克侃大山。我们之中有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年青工人，尖嘴猴腮，戴一顶鸭舌帽。他经常向大家吹嘘结婚前他如何追他老婆，如何先下手为强，然后用手比划着说儿子如今刚刚一尺长。

轮到他上岗了。几分钟后，只听见一阵枪声，他被抬了下来，一只眼睛蒙上了绑带。他为了过枪隐朝对方山上放了几枪，暴露了目标，对方机枪一阵回射，人没中弹，溅起的碎石打瞎了他的左眼。还好，儿子已经一尺长了，是不是独眼龙已不重要。

一天黑夜，我们奉命向西山逼近。刺刀上枪，子弹上膛，一队人无声无息出发了。途中过一座桥，我心里很紧张：对方如果在此设伏，我们全完蛋。猫着腰过了桥后，我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遇埋伏。接着，到达一片开阔地，大家拉开了些距离。一百多公尺外有个村庄，村外有座小山，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时，月亮穿过了云层把开阔地照亮，西山主峰上立即来了一阵扫射，只见前面几十米处三个人

应声倒地，其中两人受伤，一人死亡。我们趴下不敢动弹。当月亮躲起来后，死伤者被抬了下去。黎明前，我们攀上了那座小山。

小山就在主峰的眼皮子下。太阳出来后，我既不敢乱动，更不敢放枪，只是默默地盯着主峰，想发现对方的位置，但什么也没发现。也许对方更聪明，天亮前撤到了山后。我们一无所获，在山上干渴了一整天，忍受着蚊子的袭击。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才从山上爬下来，回到造纸厂。

几天之后，造反派退守城内，我们这队人马终于不费一枪一弹上到主峰峰顶。在峰顶上俯瞰市区，市区被群山环绕着，山青水秀，武斗似乎从没发生过。

就在这时，山脚下对方区域出现了几个人，我端枪瞄准。当食指搭在半自动步枪扳机上时，我犹豫了：这几个人是谁？我为什么要向他们开枪？他们与我何仇何恨？这是几条人命，不是几只蚂蚁。犹豫再三，我关上保险，把枪放下。

时至今日，我为那一刻没有扣动扳机庆幸：我经历了武斗，但没有杀人，也没有被人杀。我始终都很幸运。

（八）

假设你很年轻。

你也许看过电影上甘岭和英雄儿女，当战火硝烟的镜头控诉着美帝的残忍和志愿军的英勇，你将会热血沸腾，要当一名王成那样的英雄。

你也许看过电影红日，当身边战友在对方的枪林弹雨中倒下，你的心会充满仇恨，奋不顾身向凤凰山冲击。

你也许看过高山下的花环，当苍松翠柏映衬着一排排的坟墓，活着的人朝天鸣枪悼念死者，你的心会凝固，把生死置之度外。

当你仅仅因为说了两句话就被对方拳打脚踢，跪在地上，你的心会流血，发誓要报仇，以牙还牙。

文革时期，两派互相仇恨。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在内，就这样参加了武斗。而引起这一仇恨的人，就是那位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红太阳。

一九六八年武斗期间，双方高音喇叭唇枪舌剑，最为对方痛恨，喇叭常常被子弹打成蜂窝状。附中高二一名很秀气的女生Y成了保守派播音员。在播音时，一颗子弹从她左臂打入右后背穿出，打断了主动脉。可怜芳龄少女，就这样命归黄泉。Y的追悼会，成了报仇雪恨的誓师大会。全副武装的保守派车队护送灵柩穿越市区到达墓地，下葬时排枪朝天鸣放。几天后造反派再次攻击该据点。就像当年越共袭击边和机场一样，造反派用定向炸药包把该据点夷为平地。

几星期后，Y同年级一造反派男生J在进攻保守派据点时头部中弹，J的葬礼也如同英雄一般，苍松翠柏伴随冲锋枪长鸣。

整个武斗期间，仅附中学生死亡十人，其中保守派三人，造反派五人，还有两人是被流弹

夺去性命的无辜者。

武斗期间，两派都在各自占领的风景区内建立了烈士墓地，墓地里水泥青石坟墓一个挨着一个，一排接著一排，青松翠柏环绕四周。这些墓地文革后期全被当局炸掉，不留丝毫痕迹。

一九六八年六月，G省武斗进入高潮，全省各地一片枪炮声。七月中央发出布告，军队全副武装介入，围剿造反派。那时我已从武斗前线下下来，去省城看望弟弟妹妹。省城的造反派据点被军队强行攻克，凡抗拒者均被击毙，从据点里出来人全都被关押。时值雨季洪水猛涨，很多躲在地洞里不愿投降的造反派被大水活活淹死。我看见市中心一座桥下漂浮著多具尸体，空气里散发着腐臭味。

其余各地，军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G市的造反派见大势已去，放下了武器。造反派的头头们纷纷投案自首，被关押起来。与此同时，各地的保守派成了中央认可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趾高气扬地在军队支持下掌了权，并对造反派实行了疯狂的打击报复。在许多地方，某人只要被指认为造反派，就会遭到乱棍。在一些边远农村，武装民兵对地富反坏进行灭绝，甚至烹食阶级敌人之肉。中国的历史反来复去，几年之后，那些打人杀人的英雄，又成了三种人，受到了刑罚和处分，那是后话。

保守派刚获胜时，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扬眉吐气，很快我对那疯狂的报复感到厌烦和恶心。紧接着，军宣队工宣队进校，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开始领导一切。

六八年底各地成立了革委会。当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后，红太阳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附中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在研究了红太阳的最新指示后决定：初三以上的学生全部下乡。别无选择，我带上高中课本，带上二胡，带上自己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去插队了。

（九）

两年之后我进了工厂。一九七一年，中国的政治气氛再次诡异。十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母亲在听完中共中央的一个传达后来到我房间。

“你猜猜，上面出了什么事？”

“林彪出事了。”我回答。

很快，批林批孔开始了，不久又加上批周公。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去世。清明时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悼念周恩来的民众被当局无情镇压。

一九七六年七月，朱德去世；同月，唐山大地震。十月，毛泽东去世，举国上下一片哀声。在毛泽东的追悼会上，许多人痛哭流涕，有人甚至晕倒在地。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心里很高兴：这一代暴君终于寿归正寝。

（全文完）

~~~~~

【痛定思痛】

## 新中国永远的痛楚——追忆文革中儿童所承载的历史细节

• 王俊生 •

1967年的冬天充满阴霾，无论南方北方，到处都被浓重得化解不开的冬云笼罩着，正是在这样阴冷而奇寒的自然环境下，1949年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文化大革命”开始爆发了。

关于对这段黑暗历史的回忆与分析已经浩如烟海，其中许多人都在努力寻找与界定文革的起因与影响，试图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分析文革的现象。然而其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来自于成人的视角，而且几乎所有的分析内容也多与成人有关。同时，对于文革中所发生的暴力行为（当然也包括与儿童有关），多数文章又仅侧重于对其的揭露和表达由此而产生的义愤，而却很少有人去探讨暴力的本源：为甚么当时的儿童如此残忍和无情？难道仅仅由于他们的无知而受了某些人的指使和利用？显然不是，因为无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一个几岁的儿童，以一种成人般政治狂热的心态去摧残自己的老师、同学，甚至是父母，仅仅用“政治误导”来作为动机和原由实在是过于单一和肤浅。

如我们所知，细节里常常有最准确最深刻的历史记忆，它不但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且也能体现一个民族的心理奥秘，尤其是背后的文化等支撑因素，因此记忆细节也是记忆历史的最好方式之一，这一点对于文革中的历史来讲更是如此。因为文革远还没有成为我们无法想起的历史，反而是我们今天许多仍然健在的人的一种切身经验与体验，是我们曾经由自己的荒诞与愚蠢所造出并又由我们自己所承受并消化的现实苦难，同时这种苦难也会深深地烙在我们的神经上，时时徘徊在我们恐惧的记忆里。从人性上说，每个人都希望摆脱记忆中的苦难与恐惧，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遗忘决不是通向摆脱的门径。事实上，为了从真正意义上摆脱这种痛苦，就更需要我们仔细反思我们曾经经历的痛苦，反思我们曾经的愚蠢与荒诞，尤其是要思考这种愚蠢与荒诞背后的支撑因素，同时要用真诚的忏悔清算我们的过失，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同样荒诞与愚蠢的历史不再发生。从这种意义上讲，对待历史，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正是出于这种考量，笔者愿意重新把那痛苦的记忆敲醒，同时转述文革中的儿童、现在的清醒者所提供的细节，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些理解与思考。

### 一、感觉非常热闹

——1966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文革爆发了。那时候真觉得好玩，今天开这个大会，红旗、标语、传单；明天开那个大会，传单、标语、红旗，还有串联的红卫兵在街上围上一圈演节目。最让人开心的是看牛鬼蛇神游街了，高帽子一戴，大牌子一挂，小铜锣一提，走两步，敲一下，嘴里还要报着自己的“头衔”和“罪名”。还有开批斗会，走资派站高板凳，造反派搞“喷气式”，这些都让九岁的我感到新奇和有趣，同时也因为停课闹革命，我可以不用每天去学校规规矩矩念书而感到从未有过的解放。六六年在这热热闹闹中过去了，六七年又开始武斗了。常常和小伙伴远远爬在树上或房上，欣赏着武斗双方拳脚、棍棒相加的精采场面，以致于常常误了吃饭，让我妈扯着嗓子在门口喊我。（引文见杜林怀《文革中的“六一”节》）

不再需要对这种类似的文革细节做更多的追忆，也无论以前的人们对文革中的奇谈怪事做出何种解释，我们在分析文革带给文童的记忆时，首先都不能忽视他们的天性。他们因为年龄小，所以活泼、好奇、好动、好玩，这也是孩子与大人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外在区别。文革中由于许多机关单位和学校停止工作和学习，他们经常举着横幅，喊着震耳的口号声，并挥舞着红旗去上街游行，场面的确十分热闹壮观，这一点无疑迎合了孩子希望看热闹的心理。同时，对于城市中的孩子来说，按照当时的指示，不但要学文，还要在每年的农忙季节下乡参加农业

劳动，农村中一马平川的田野，田野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等都令他们兴奋不已。

这正如我们常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中东一些国家的儿童军那样，他们从动作上看，或者象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军人”抱着冲锋枪向对方射击，或者身绑炸药义无反顾的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时候你很难观察到儿童应该具备的稚嫩，甚至很难说他们是儿童，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容易忽视他们在战争之外有关天性的一些东西。但是另一个方面，据统计表明，就是在儿童军最多的中东地区，每年玩具的消费总额达到12亿美元，他们每个孩子每年在玩具及游戏机上的花费是263美元，这是欧洲儿童花费的两倍。

因此，面对文革中发生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而且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往往又是全民族、全社会、全国家在狂热氛围支配下并给予了狂热的支持而发生的，这种氛围正好符合并迎合了儿童的天性，因此他们好奇、他们热闹、他们兴奋。可以说，这是文革首先给当时的儿童所留下的最深刻、最直接的记忆。

## 二、阶级分明，个人崇拜

——一些平时看来很和蔼的街坊老大妈被挂上了沉重的铁牌去扫地，铁牌上面用白色涂料写着一贯害人道坛主或逃亡地主婆之类的醒目大字。邻居周医生挂的牌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李工程师挂的牌是“反动权威”。平时在一起玩的孩子们，也不像以前那样自然地说笑了。哭声、歇斯底里的骂声不时从邻家的窗户里飞出来。在附近上中学的菊香，一天从学校回来大义凛然地造母亲的反，只听她在街上叫道：“不要脸，不要脸，二嫁，二嫁。”……而她正是郑妈妈第二个丈夫的孩子。……我所在的工人新村小学是以工人子弟为主，而在我们班里，并没有甚么地富或资本家的后代，像我这样的旧职员子女便成了凤毛麟角，再加上文革前做过两年的班主席，俨然成了刘少奇在班里的代理人，变成众人发难的对象。（以上引文见辛洁《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那时年少，幼小的心灵里，还牢牢的记着老师所教给的，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以上引文见达到《我在文革中》）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从小就被灌输在儿童头脑中的一个概念。起先的这个概念还是泛泛而谈，后来的口号就比较具体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后来就成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甚么事都要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从当时出现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等，我们可以看出阶级斗争在当时的普遍性。在这样一个阶级分明与政治斗争为主的年代里，国家、社会内部的任何群体，以及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逃脱这样的烙印——很自然的用阶级敌友的标准来区分彼此，而且这种区别又随着在学习生活中的刻意化进一步得到强化。很和蔼的街坊老大妈、白衣天使周医生、以及李工程师都因为自己的职业被划为敌对阶级。就是在班级里，小小的儿童也因为自己的出身仅仅比别人好点，就被其他儿童称为“资产阶级走资派刘少奇的代理人”。

这种情况就是在今天也可以看到。例如，在朝鲜，由于其领导人主张人民要树立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并通过阶级斗争彻底消除敌人。在这样一个氛围内，孩子们也很自然的以这种思维去观察世界。如，去年凤凰资讯台播放了有关美国记者在朝鲜采访一些小学生的的一部记录片，到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这位美国记者让其中一个小学生代表对着摄像头向美国总统布希说最后一句话，这个孩子毫不犹豫的对着镜头说，“我们奉劝资产阶级的美国不要再残杀南朝鲜儿童了！”。可以看出，在孩子们的观念里，对对方的界定首先是资产阶级，其次才是具体国家美国，最后很自然的得出他们是残杀同胞的敌人，这一似曾相识的强烈的阶级意识观又一次让我无语。

这些记忆可以说深刻地影响了至少一代人的思维，理解了那个，就很容易理解为甚至到今天我们中的某些人为甚么仍然非常习惯于把很小的一件事情上纲上线。

同时，在那个年代，大搞个人崇拜，以至于小小的年龄就认为自己的一切不是自己、也不是人民群众奋斗的结果，而是某个大救星所赐予的。这其中暗含的深意自然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救星，自己就得不到解救，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就是后来在中国愈加严重的个人崇拜的深层次因素之一。就是到今天，这种记忆也不同程度地深刻影响着许多人的思维，例如我们常说的“第几代领导人”，以“代”作为区分不同时期领导人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和政治学中民主的本意相违背的提法。再比如，去年在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去世时，中央电视台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竟然充满忧虑的发出“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人们是否还能建国”的荒诞言论。事实上不仅是这位主持人，只要翻翻报刊，当时许多国内一流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分析阿拉法特去世后的中东局势时，都不由自主的发出了这样的担心。但事实呢，中东和平进程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中断，而是在巴勒斯坦新任领导人阿巴斯的领导下照样向前发展。

### 三、栽赃欺骗，是非不分

——后来，这种栽赃的故事越来越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次去乡下劳动，老师要求同学们不要偷吃生蚕豆，那是生产队的财产。当几个偷吃蚕豆的男生给老师抓住后，他们非说是看见我偷吃以后他们才吃的。无论我如何流着眼泪向老师申辩，她都不理，还一本正经的样子：“这么多的人都说你偷吃了，你还狡辩甚么？明天拿两角钱交到学校，算罚款。”明显地讨好这些工人子弟。（以上引文见辛洁《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字。……这时，爸爸对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以上引文见达到《文革中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在那样一个全民政治狂热的年代里，一切都服务于政治与政治斗争。如果你不能在政治上打倒对方，对方就可能把你打倒，并毁掉你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明白了这个，也就明白了上文中的老师为甚么要欺骗孩子，因为他要要想保全自己不被批斗、打倒，就必须讨好工人子弟。为了讨好工人子弟，就只有做出有背师道尊严的事情；第二个例子，两派成人之间为了在政治斗争中打倒对方，竟然利用天真无邪的孩子。更为荒诞的是，他们利用的正是儿童们最优秀的品质——天真、诚实。试想，你打击别人，利用的正是别人的优点来欺骗别人，多么残忍！从这个层次上说，无论老师还是儿童都是那个荒诞时代的无辜者，都是牺牲品。

今天看来，文革中所出现的栽赃欺骗与是非不分的情况也与整个国家和社会大的氛围有关。在文革那样比较保守的时代里，人们所获取的外部真实资讯非常少。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人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要去解救他们等等。再如，我们当时常常看到的一些其他口号，如“超英赶美”、“亩产十三万斤”等明显是满口虚言、自欺欺人，但是这种或许大家都清楚是骗人的口号，但在当时大家竟然都相信。这种从上至下的集体欺骗，导致了人们一种在精神上空虚的狂热。这种例子再比如朝鲜，近几年该国一直在闹饥荒，但到底有没有饿死人，饿死了多少人，在那种体制下，我估计是不可能有什么基本统计的，准确更谈不上。今天，我们可以肯定朝鲜正在发生饥荒，并饿死了很多人这样的确切消息。但是，由于其国家宣传认为其他国家的人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其政府多次指责国内出现的所有困难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反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给朝鲜抹黑制造的，那么朝鲜人们就无法知道自己正处于一个集体欺骗之中，这种欺骗的链条也逐渐会从国家到社会，集体到个

人逐渐蔓延与延伸。因此，在笔者在和朝鲜留学生交谈时，当听到他们竭尽全力拒绝承认真相时，我真的怀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真相，还是如文革中的中国人一样陷入了一种集体的欺骗之中。

#### 四、师道尊严被抛弃

——毛泽东和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其实就是类似教师上课时，学生可以打瞌睡；作业完不成，抄一遍别人的也不错；学生不要作分数的奴隶这一类的很平常的谈话），师道尊严被彻底地抛弃了……一次老师管了在上课时悄悄吸烟的同学，第二堂课男同学们就几乎人人在上课时悄悄点上一支绒纸拈，教室里到处冒烟，老师到处查，却没一个吸烟的，气得老师从此啥也懒得管了，教室里最乱时，竟然是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的同学却在满教室里滚铁环玩。（以上引文见达到《我在文革中》）

——不久文革开始了，学校里乱成一团，一夜之间美丽的校园给大字报覆盖住。楼道里，走廊上，任何可以张贴的地方都贴满了高年级同学攻击和揭发老师的大字报，学生们借此机会发泄种种平时对老师的不满。……大字报里充斥着对老师的嘲讽，对老师直呼大名或绰号，如教体育的丁正洋老师，改为丁大洋，教历史的马老师叫胖马，教体育的田老师则称田小头……。（以上引文见辛洁《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与礼仪之邦，春秋典籍《论语》中便着力宣扬了尊师重教，后代儒生仕子们一直以之为荣，可为甚么文革一爆发，老师对这些儿童的态度与文革前有了截然不同的转变，甚至象陌生人一样？为甚么这么听话、尊重老师的儿童，一旦到了文革爆发就那么肆无忌惮的给老师戴上高高的帽子，让老师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用尽人间所有能挖苦讽刺的语言去污蔑，甚至武斗？事实上，原因就在于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不关注道德与伦理，而只在乎斗争与结果。如上面的那个老师之所以在文革前后对学生的态度发生了截然转变，用作者自己的话就是说，“想来想去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怕班里太风平浪静，学生们可能会去注意到她的言行和家庭，因此班里必须存在着一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对象。二是承受不了社会对她的丈夫的不公待遇，怨气无法排遣，只好发泄到无辜的我身上。”这就非常清楚了，无论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多么让老师不满，但怎么也不至于让老师屡屡从这么一个儿童的痛苦中获得快感，因此如果不是作者分析的这样，我们永远也不能找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此外，这个也可能与现实生活中教师长期对儿童天性的压制，甚至摧残与关，如无邪的天真被视为无知，广泛的兴趣被视为问题，正常的活动被视为好动，执着的追求被视为愚顽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儿童的天性，是他们不断成长的基础。长期以来，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不平等的，他们总是依靠“征服”或“围剿”学生的心灵求得教育儿童的畅通无阻，而不是“蹲下来”用儿童的思维与儿童的眼光平等地去与儿童对话。心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包括儿童在内）如果早期他曾经受过不公平的对待，那么他内心就极易产生病态的报复心理，是否报复以及如何报复，就要看有没有报复的机会，以及这种机会的深刻内涵是甚么。因此，这些心灵长期被老师“征服”与“围剿”的儿童，一旦碰到文革这样一个让他们自由宣泄自己感情的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甚么文革中师道尊严为甚么被彻底地抛弃了。

#### 五、不仅文攻，也要武斗

——爷爷被十几只年轻粗壮的手臂死死按在他坐的那张木椅上，拳头、皮带雨点般洒落在他早已佝偻的头颈和背上。实际上，儿童组成的红卫兵们完全不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按住爷爷，

爷爷根本没有打算再作任何反抗，他在爆发的瞬间已经用完了自己全部的力气。

“停！”……他担心这个老家伙就这么一通乱揍给打死了，那可实在太便宜了他，而且于他们自己也不够过瘾。（以上引文见《爷爷在文革中》）

这样的暴力活动，以及类似的暴力活动太多了，以至于人们对此甚至有些麻木。而对于文革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多数文章又仅仅侧重于对其进行揭露和表达由此而产生的义愤。却很少有人去探讨暴力的本源：为甚么当时的儿童如此的好斗与无知？为甚么那么残忍和无情？

如上所述，传统的学校教育，老师与学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老师是主导。而在家庭中，父母也是主导，他们之间的地位也不平等，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因为儿童犯了点错误，老师或家长就把学生批评的低头不语，死气沉沉，多么象员警审问罪犯！这样其实就使得中国少年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大的恐怖和狂躁。只要遇到机会，就会彻底的爆发。今天看来，文革也许给他们提供了尽情狂热发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最佳条件。没有管制，没有权威与道德，只要你内心不满，就可以任意的宣泄。因此，面对这么好的机会，文攻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宣泄了，他们必须要武斗。

入围2001年第五十一届柏林影展竞赛的中国电影《十七岁的单车》后面部分的情节尽情渲染了这种“武斗病态”。可以看到，那位城市同学首先几乎是无法停顿地，歇斯底里的摧毁那辆农村青年心爱的自行车。他使劲踢摔，表情麻木，一下，两下，三下……车子已经彻底踢坏了，但他仍是无法停下，更加用力、充满仇恨、并疯狂而病态的用尽全力企图更为彻底的破坏这辆自行车。可以看出，无论他如何实施自己的暴力仍然无法解除心中的愤怒和仇恨。于是开始对男主角进行更加残忍的殴打，从他的残忍上你会怀疑他们打的是不是同类！他已经毫无反抗的能力，但是对他凶恶的施暴却没有半点犹豫。面对鲜血淋漓头颅，明显伤残的肌肤，面部痛苦的表情，和撕裂的呻吟，施暴者从容不迫，毫无人性地继续摧残。从打手的眼神里，动作上，你无法把他想像成为自己的同类，而是更类似于一群猴子在围着正在烤着他同类的尸体前，异常麻木并欢呼雀跃地等待着食用即将烤熟的肉。

## 六、一切政治运动化

——下面介绍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例如：

1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红太阳。

2 舵手来了！救星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安源来了！

工农兵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是大海航行的舵手，象这种写法叫比喻。

3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你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扎根，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焕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巩固，工农业生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热气腾腾。

（以上引文见：1969年7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组：重庆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一年级用）第一单元摘选）

这方面的例子其实在文革中最多。中国人热爱政治运动，甚至政治狂热是有历史来源的，古人就告知我们要“学而优则仕”。当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文革年代。当时社会、国家的一切都被狂热的政治斗争所包围，这个可能也是文革中的儿童最深刻、最直接的记忆之一。这一点从当时、乃至今天仍然存在的许多政治宣传口号上，也可以看出来，如“枪杆子里出政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等。正是由于这种狂热的政治斗争，却给这个时期的儿童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一方面，由于在文革中他们的父母绝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卷入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

而那个年代号召“大公无私”，谁要贪恋小家庭，就会被视做不要求进步之类，因此这些儿童并没有得到父母精心的呵护，有的甚至如上所述，成为成人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有的父母由于在政治斗争中受到了委屈，回头就把仇恨转嫁给他们的孩子。因此，这个时期的儿童由于文革在心灵上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伤害。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在一定条件下搞类似的“抗日救亡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政治运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政府与社会应充分依靠和利用国家机器来实现，将所有任务纳入法制的轨道，而不必再采取类似文革容易给党和国家都造成严重损失，并引起社会巨大震动的政治运动。

中国人热中“政治挂帅”的天性就是在目前的台湾地区也可以看到。在去年台湾地区“三合一”县市长选举中，一共有二十三个县市长候选人，选举拉票造势时前后有十六个当众哭了，下跪的也多达五个，这次选举的热情与激烈就是其典型表现。

可喜的是，笔者常常能看到当代中国的许多儿童，当他们看到有关朝鲜的记录片中的儿童所表现的过早的政治成熟时候，他们都是无奈的、不可思议的转过脸去，默然走开。就这么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的成长，属于健康的一类。

## 七、怀疑与希望求知

——父亲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注：文革中群众私设的监狱），我们家的生活彻底变了样，从一个注重教养和学识的家庭、受人敬重的家庭，变成了处处受尽歧视欺凌，被社会唾弃的一家人，……那时我想不通为甚么，自己那慈祥温和，勤劳正直的父亲，怎么可能竟是这个社会的敌人，想不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甚么不需要象自己父亲这样的好人，这究竟是为甚么？那个顽皮活泼、爱笑爱闹的小男孩从此消失了，变成了沉默寡言、再也没有笑容的一个人。（以上引文见达到《我在文革中》）

——我的家乡在连云港赣榆县城南乡，……我清楚地记得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英语、理工、化工、农知、体育、学劳等课程。在艰苦的学习生活中，每个学生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写满了“求知”二字。（以上引文见 新浦 董兴平《文革中的戴帽中学》）

儿童时期应该一个快乐、幸福、且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是这些孩子由于身处这样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年代，就过早的告别了童年。但是由于他们的天性使然，起初面临这么一个狂热、热闹，充满新奇的年代，他们感觉兴奋与好玩。但是，随着残忍事件的增多与升级，他们就开始体验他们所不应该体验的酸楚与残忍。这样，他们就开始逐渐对人生的前途充满了困惑与迷茫，甚至对国家、对政府、对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怀疑。事实上，翻开沉重的历史记忆，这个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

同时，翻开沉重的历史可以可以看出，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一方面由于人们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到了斗争与好奇上，另一方面，政府高层也把教育放到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上，因此他们用到学校学习上的时间异常少。但是，人类求知的本能欲望又促使他们去寻找一切可以寻找的机会去学习，去求知。事实上，时至今日，当问起经历过文革中的人甚么时期读书最多时，他们会告诉你不是你所料想的“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或“目前任教”阶段，而是“文革”时期，因为“文革”使得他们失学，也从而使得他们恐惧与空虚，因此为了抑制内心的恐惧与空虚，他们就竭力使自己沉醉（麻醉）于书的世界以忘记令人难堪的现实。

经历文革的这些儿童，如今年龄大致在五十岁左右，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都正在中国各个部门、行业中起到中坚作用。童年本来应是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黄金时代，但

他们却是在充满歧视，谎言，诬陷，屈辱，惶恐，趋炎附势，以强凌弱，愚昧中挣扎着过来的。对于他们来说，想起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心里就充满了惆怅以及无比的失落与酸楚，这一段悲惨的遭遇在记忆中是那样清晰，历久不褪。是的，他们也不应该轻易忘记这一段荒诞而野蛮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教训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时光飞快的流逝，眨眼之间中国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究竟犯下了多少类似文革的过错，以及我们究竟掩盖了他们其中的多少，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国已经无法得出确切答案了。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也不想去追究，反而是拼命地去掩盖和遗忘，结果历史往往在这个方面表露出惊人的相似，常常使这些苦难重演！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记忆历史方式：只怀念项羽的意气千丈宁死不屈，而不去想他活埋二十万俘虏时的残忍；只知道长城非常伟岸豪迈，并一再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虚弱与萎顿，而不去思考这种构想本身的残酷和每块石头下无数惨受折磨的骨头；只赞叹紫禁城内的金碧辉煌，而不谴责宫廷中曾经的阴暗、糜烂和权力的残暴、恶毒、罪孽；只一再称赞农民起义的道义和复仇的快感，而根本不去记载他们给历史一再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我们既然养成了这样的记忆方式，当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内心虚构出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至于历史的真实，尤其是历史中的细节，那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笔糊涂账。

事实上，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它的真实性就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尤其是这些记忆中的历史细节中。对于现代的我们，文革中这些愚蠢与荒诞的历史记忆难道仍不足以唤醒我们的记忆吗？在我们有限的神经上，要使这样的荒诞与愚蠢重复发生多少次，要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遭受到多少次磨难与屈辱，才能终将它浮到良知的水面上？在此种意义上，本文再次展示文革中儿童那种无法承载的历史记忆，并给予一些谨慎的审视，其初衷正是为了避免这些类似不幸的发生，而并非为了再次掀开我们伤痛的疤痕！

□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7月

~~~~~  
【难忘岁月】

文革十年——在华北电力设计院的经历

· 卜 毅 ·

当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传达后，我明白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市委首当其冲，揪出大批黑帮，我是从北京市委调到中央的，而大黑帮头子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是我十七岁参加革命时的第一个领路人和长期的领导人，他成了“地富反坏右的大保护伞”，他自己也被整成“叛徒、特务”。他是对我抗日时期被捕问题做结论的负责人。我还跑了吗？66年6月某日，“文革”一开始，我就是本单位被抓出来的第一号人物。这里要说一下，要抓我的两个主力是政治部的主任和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文革中的积极份子，是跟着他们跑的。他们二人对我的历史可以说毫无所知，他们也无任何材料。为什么他们对打倒我那样积极和感兴趣呢？我觉得因为二人对我都有些小私怨而已。他们都是农民出身，对搞运动都是很积极过人的，所以看准了我。因私怨借运动整人的事是搞任何运动都有的，而“文革”中出的最多，常常是为了不大的事，就想整对方于死地，实在不少，我算赶上了。当时我在设计院已有十二年了，我可以和群众的关系应当是很好的。设计院的群众应该是不错的，对没有什么根据的事，群众还是不轻易扣帽子的。但是有领导带头，自然认为是有材料的。

再说有什么小恩怨呢？二人中一个，他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不过一年多，对知识份子多的设计院工作很生疏。不论在大会上或小会上，常说些不了解情况，又带些下结论的话，例如在

大会上说“你们知识份子，读书多，应当觉悟高，其实很不怎么样。”小会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总带有看不起知识分子的情绪，我虽然没提什么意见，但常不自觉的摇摇头。此事被他的夫人看到，她和他丈夫说，你发言时，卜院长总摇头。另一个女同志，她丈夫是在第二设计院的主任，当时从院领导到设计各处，一把手大都是工农干部，都不太熟悉生产业务。那时院领导还轮流下到院里部门协助工作一段，自己也可学习提高。我到过二院，回来后向院里扩大会做个汇报，我汇报二院工作时，当然要提到工作中的一些须改进的问题。这位女同志参加了会后，回去气愤的说“卜院长在，我们某某（其丈夫）呆不住，早晚得走人。”

又一件事，是我曾代理过一段政治部主任，她是宣传部门负责人，写过一个向部里送的宣传工作报告。我看后提了两点意见，一是把关于我对宣传工作如何重视，如何关心的词去掉，因我工作时间太短，没做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可提的事。第二点是，汇报中提到各式各样的思想问题，说了不恰当的话等，把人名取消。她很不同意，不同意也有理由，过去很多做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群众的思想状况，发了什么牢骚，说了什么不当的话等。运动来了时，也可做备查的材料。我认为宣传工作，收集思想状况的具体事例是可以的，目的是为了归纳出一些问题，研究出一些教育和启发群众办法，提高群众的认识。所以我认为，点名道姓的没必要。我这种看法传到做政治工作的同志里，有的人说我不会做政治工作。也有极少的同志同意我的看法，但并不表态。当时政治工作气氛是，党的工作是高高在上的，是教育群众的，搜集某某人的错误思想是必要的，到运动时就成了批判的素材。这种做法我不习惯，理由是我是做地下工作出身的，要启发群众的觉悟，更要依靠群众。不然群众，怎能保护我们？要以教训人的态度出现，群众还会接近你吗？

城工部刘仁同志领导的政治工作中，也没有总去搜集群众的缺点和问题，也没有总把群众当被教育的对象。在北京市委时，领导干部和一般同志间很少有等级之分，对书记和副书表示比较尊重，常称他们为某某同志。很少有处长，科长的称呼，一律叫名字。直到我调动前都是这样，比较亲切。我到中央部门以后，就是一片局长、处长、科长的称呼声。政治工作的做法也有很大区别，我很不习惯，当然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这也是我不喜欢做政治工作的根源之一。例如53年，在市委时，我们局领导让我到当时较大的一个药厂做党委书记兼厂长。（当时有党委书记是很大的工厂）我一听就有点发毛，我认为我不会干党委书记，肯定干不好。我用了些很不妥的理由推辞，我说到药厂去就是捣药片，太没意思了，我不想去。当时的局长是在地下领导过我工作的同去，所以我对他比较随便，我坚决表示不想去。他将此事汇报给刘仁同志，刘说她不想去就不去了吗！局长回来告诉了我，我求他拖一拖吧！刘不再问就算了。后来我真没去。就当我的计划科长挺好。

其实我当这个科长也不安心，从一解放，我就认为我该学习去了。我已经离开学校十二年了，我应当上大学，学一技之长，为建设社会出把力。我心里明确解放后重点工作就是要搞建设，要建设就要有技术，我又喜欢这种工作。（并且我在北京市工业局工作）因此我总不忘，进一步学习深造。1954年中央要求地方输送一些干部到中央工作，我也不了解详细情况，就主动要求去，想到中央的工业部门工作，没料到真批准了。我很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要的是司局级干部，但在当时老干部中，我是高中毕业，算是很不错了，就让我顶个司局级干部去了。去后分配到燃料工作部。从北京市走时，市委请我们大家吃了一次酒席，是我参加革命十几年后第一次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当我看鱼中有一种是带鳞的，我很奇怪，问我右边的老杨同志，这鱼怎么带鳞啊？他说这是一种极贵的鱼，可以吃，我就吃了一大口，左边的同去说不能吃鳞，果然用筷子一碰，鳞就整片的落下来了，是不能吃，肉可极为鲜美。我拍了杨一下，我说“你成心让我漏怯”。

话扯远了，转回来谈，当时院里搞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我看不起他们。一个人认为我对他将来升官障碍极大，一个认为她丈夫将来在我们院呆不住，所以对我意见极大。“四清”运动

时，就不打算让我下楼，开除出去。到66年“文革”时，可是好机会，揪出来一个大号的走资派，还是叛徒，可有干头了。“文革”一开始我就是第一号的批斗对象。那二人从来没面对面对面批我，但他们是幕后的主力操纵者。把我揪出来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里什么也不知道，还正在办事。突然总局的刘副局长进来了，他走到我面前急促的说：“你可要有信心，心里有数，到外面看看大字报去吧。”说完他就走了，当时我就感到这是一个关心我的人。但我很坦然，我走出办公室的门，就看到走廊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我的大字报，这是第一次我看大字报，我想看明白倒底是些什么呢？从这一次到以后七、八年，院时不断有我和各种人的大字报，我再没仔细看过。因为我明白了大字报上说我的问题，原来都是胡说，大字报上我不但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还是“叛徒”，还是“四反分子”，所以再看有什么意思呢！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四反分子”只有一张，说“叛徒”的有几张，也不多。

再说批斗会的情况，第一次是在楼里，两个女青年架着我的两臂到会议室，里面约有二、三百人。让我站在靠东墙的平地上。刚站好，两个女同志一人拿了一个长方形木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我还不知写的什么，翻过来看看，一看是“大叛徒”三字，立刻我火气上来，把牌子自己取下来，一甩手扔出老远。可能是运动初起，她们没什么经验，居然没人捡回来，具体问了些什么用，我记忆已不清，我对每次问话，都回答一句“没影的事。”他们大喊大叫一通，就让我回去了。后来到七，八个设计室轮番批斗，当时成立了批斗我的领导小组，由水二1965年才来的一个技术员，朱某某领导，此人来我院只一年，为什么愿意当这个小头头呢？当时我从未想过，此人常一个人个别审我，说你要交待点什么私事。但我有什么私的事呢？我自己都不知道，他要知道什么呢？因为他个人，当然也没有发生什么打人的事。但印象深的是，夏天他总让我站在窗前站着，让太阳晒我几小时，晒的我浑身大汗。冬天他把窗户打开一个缝，让冷风吹我几小时，让我觉得此人甚为阴险。

有一次是三个人审我，他为主，他提到北京市委有个处长说，我和他关系很密切，是什么关系。我说是同志关系，我们很说的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处长文革前私人生活不甚检点。北京市委全黑了，名为黑都，他当然也要受批判，但时间不长，文革初期，他就自杀了。这个朱组长想把我牵进去，但问不出所以然只好作罢。他们又说你看到楼前的大字报了吗？我说没看到，他说上面揭发了，刘仁在峨嵋酒家饭店为你主持婚礼吗？我说要说得细说。他说把关键问题说出来，我就简单说了过程。我叙述说，那天在峨嵋酒家有一对同志结婚，他们是地下党员，刚工资改制。所以开了几桌酒席，请了很多领导，朋友和亲戚。刘仁和我的领导老余，（市委组织部部长）也去了，商量说我和丁人同志恋爱好几年了，最好合并也办了。后来他们派人来我单位找我，而且让我快点去，也没说什么事，我当时正在单位厨房里帮厨，穿了一件制服，胸前有许多油点子，我说换件衣服再去。来人可能不知刘仁他们的计划，说别换了，没关系，快点走吧！我就跟他们走了。去后发现是这结婚事，而且派人把双方家属都接来了。结果是开了一次席，结了两对人的婚，也没什么仪式，更没有设什么证婚等做法，吃完饭，我们没花一个钱，就这样结婚了。沾了那一对同志的光，实际是结了一个没花一分钱的便宜婚，倒也别致。看来他们听得很仔细，反复询问，浪费时间。

以后进入深入调查阶段，就把我和有问题的人关到当时所谓的“牛棚”里，进行深入检查，在单身宿舍里关了一些有问题的人，此时社会上风声很紧，“牛棚”里人也紧张，开始只是关着，我们的三顿饭要排队从单身宿舍楼走到食堂去，人家都是先用饭，“牛群”后去。这时偶尔听到某某人跳楼了，某某人在单身宿舍上吊了，但我见到的只有我们楼的邻居某人，他是从南美巴西回来的，家里是大庄园主，在我们第三设计室工作，当然是因为要斗他了，那天他从我们房间门外走过去，自己拿着枕头，被子等，我知道他也被弄到“牛棚”了。没过两天，此人不见了。以后我才知道，他进来第一天，就说要到设计室拿什么东西，让他去了，该设计室在五楼，据说趁没人的时候，他就跳楼了。他是我同楼同门的邻居，知道他一些情况，此人长的白胖胖的，见同楼人都点点头，很有礼貌，但不爱说话，同志们说他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负责。又说

他脾气挺大，看来他受不了这种侮辱，于是自杀了。她妻子是张家口的教员，有两个小孩子。后来她去了广州，哪年不记得了，她来过北京，还到我家来看望。后来听说她可能回了巴西。我们设计院像她丈夫一样跳楼，或上吊自杀有五件。

再说“牛棚生活”每日三餐，每次一个窝头，一点粥，吃的很差，当时胃里也没吃的要求，所以不在乎。但感到不痛快的是，三餐在院子里排队来回走六趟，群众都瞪着眼像看怪物一样。有一次我也抬头看了看五楼顶，心里想跳下来倒也罢了，只此一闪就过去了。说死，我都有准备，我不怕死，但还是有点担心孩子，那时学校里“闹革命”闹的很凶，我家附近孩子上的中学，玻璃窗都给砸光了，当时市里革命派的谢静宜，还到校安过玻璃。我母亲住的南长街南口的男六中，据说把许多老师关到地下室，打死好几个，死得都很惨。我担心我孩子，学校学生“革命”没深没浅，知道我已“叛徒”，当然想孩子也可能受罪。我是不情愿死，但也不愿意死得太受罪，我也从来不赖这些本是天真的孩子，他们都是响应号召“闹革命”。有人成心搞乱整个社会，搞夺权。把罪过加到孩子们身上行吗？我也从来不怨我院的广大群众，我院多数是工科知识份子，比较单纯，开始时也是响应革命号召，参加运动的。当然也有想通过过火的革命，将来当个革命领导，简单说弄个官当当，或者说也得个一官半职的，但这是极少数。我的专案组长，很明显是这类人之一。除他外，我的专案组里成员，个个是老实人，他们自认为是在参加革命。

接着说“牛棚里”生活，三餐外，当然还有早请示，晚汇报，一个方桌有毛泽东的书，墙上供着毛泽东的照片，到时把大家集合，有人出来念“毛主席语录”，大家跟着念，为了表示后悔自己的错误言行，念的声音都挺大，看守的人十分满意。人到这种地步，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什么滋味，按说不可能笑，似乎又有点想笑。提到笑，我再说件事。院里开斗争会，特别是全院大会，除被斗人上台，全体“牛鬼蛇神”也都要参加接受教育，那一次是斗争一个老知识份子，此人姓王，我对他非常熟悉，是我院历屈的先进生产者，他是“上煤”专业负责人，特别关心这个专业的成长与发展，他组织大家做设计，成绩极佳，从设计成果到工作效率都在各专业前列，工作组织的极好，常亲自给大家上课，讲必要的设计知识，程序和问题。个别的业务差点的，他在业余时间还领到家里补课。他家里有个学校用的大黑板，给同志讲课用。他自己下班后仍继续工作，研究问题。他还有一个特点，从不向组织提个人困难，或有什么个人问题需要帮助。例如他爱人是中学老师，一直在市郊通县某中学教书，他们有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都需人照顾，可他从来不提是否有可能将爱人能调到市里。直到她爱人退休时才回来。“文革”时，这个最大的老实人，有业绩的知识份子，却被打成特务。那次开他的斗争大会，我们“牛群”都参加了，我很久没见到他，那天他被揪上台，低着头，脸色苍白。主持人问他，你是什么人？他小声细音说：“我是双料特务，中统和军统。”我坐在下面听他一说，一点也没吃惊，感到好笑，我用臂碰一下旁边的“牛”，说你听，老王是中统，我忍不住笑了。旁边的“牛”说，“你听，老王是中统还是军统呢。”我忍不住又笑了。旁边的“牛”小声说：“怎么笑了？可别招事啊！”我没惹出事来，我估计和我有同样思想的同志的人一定不少。“文革”后我去他家看望他，看见一个有八十岁的老太太坐在床上，把衣物从这个箱子倒到那个箱子，然后又倒回来，来回倒。嘴里叨叨的不知说些什么。王工程师告诉我，这是他老母亲，文革中患了这种痴病。我问他父亲呢？原来他老父亲在十几岁到北京学徒，一直住在北京，没回过农村，文革中，街道革命组织说他是地主，把他送到老家农村，老人身体不好，回去后只斗过几次就亡故了，母亲为此而疯了。老天！这一家子老实人招谁惹谁了？不值的人们深思吗？有这样遭遇的人家文革中不知有多少啊！

毛泽东搞“文革”这样的运动，真是“伟大的创举”。中国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我断定应当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不能再来了。“文革”中对所谓的反革命，惩罚真极其严重，可都是不是反革命呢？开过我几次大会，都是大呼大叫一阵空头口号，也没有确凿证据，望风捕影地批判一通，大会就算完事。后来多数是给别人开大会，却把我晾起来了。他们到全国各地

进行调查，跑了不少路，花了不少钱，看来是两手空空，没啥成果。自然我更处之泰然。要说我从来没担忧过，也不全对，我长时间担心“学生造反派”闯到我院来，心神总不定。还有我被抓出来的十几天里，基本上没能睡好觉，心里的最大矛盾是，北京市委真是所谓黑帮吗？我怎么一点也感不出来，太多的我不熟悉，单说刘仁，我很熟悉，我怎能一点感触都没有？难道我是白痴吗！我自信在参加革命这二十多年里，我每走一步，都是经过认真的思考过，有感情和思想认识基础的，我认为我不是轻易受骗的人，过去做地下工作时，你不善于识别坏人吗？现在出了这样大的变故，怎么回事呢？再三思考我不相信北京市里都是黑帮，刘仁更不可能是反革命。联想到我自己也戴了那么好几顶反革命帽子，这是真实的吗？最后我想对许多事物，应当保留冷静的态度，不信事情永远弄不清楚，一切“为什么”必会得到解答。后来，我才比较坦然的对待遇到的一切国感和困难。

在这最初的十几天，我那受过伤的胃，又大口吐血了。于是头头们派人到我家搜索盘查，了解我是否要自杀。真要自杀，当然是畏罪自杀。除了一次闪了一下外，我没产生过自杀念头，我还要在黑暗中等待天亮的那天。各种大会、小会，几人的批斗，甚至组长一人的批，我都自己数着，我有统计的方法，没去牛棚前，先是在心里记，后来多了怕记不住了，又不能记本上，就每次批斗后在家里墙上用铅笔点个黑点，到“牛棚”后，我就在室内床边上点小黑点，有记录可查。我估计起码有上百次，这种纪录是有纪念意义的，只有中国人能创这种纪录，如果大家被斗都象我一样纪录下来。定会出现“迪斯尼”纪录的。住牛棚不久，就被要求劳动改造，我们“牛群”到院里所属的一个小机械厂去劳动，开始在机床上，后来又做木工，这些事，我求之不得，我在机床上做了很多门轴，个个合格。也学会木工，锯、刨木头，还做木箱子，（不用一个钉子），工人常对我偷偷微笑一下，表示满意。对这些劳动我很努力。但每天上工，下工，我们要被押着排队从院部走出大门上大街，走两条街才到工厂，这下子我们就成了可怕的游街，街上行人们都驻足而立，上下打量我们，特别是队伍里有几个女人，十分引人注目。看见我们后，有些人指指点点，有些人张嘴结舌，骑自行车的一律下车观望。有一次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熟人，他跳下车来，张着大嘴奇怪的望着我们，他后面的汽车，按半天喇叭，他都听不见。可见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是地道的一批怪物。每天早晚两次出行，这种的滋味，实在难以言传。

我被批斗了六年，继续审查六年，不仅查叛徒，还查特务。除批斗外，就是劳动。以后又直到七八年才正式作了结论。最后一次结论之前，也做过三次结论，这三次都含糊不清。我向他们说，你们到全国各地调查，花了很多路费，用了不少人力和时间，这个结论就写不清楚吗？不是都白费了吗？不清楚，我不能签字。简单说，最后结论写了我所有的被捕过程，和逃出监管地方，直到写我在被捕监狱中表现都是好的。我才勉强签了字。以后虽然官复原职，但对我个人说，是浪费了十二年。清华毕业后回单位的几年，先是“白专道路”的批判，接着“文革”的十二年。国家给我机会花很多钱培养我，我也艰苦的学习，学习也真学了些学问，到底发挥了多少呢？做结论后我，工作了八年就退休了，培养我学习这又何苦呢！对人才的浪费，我仅仅是一个小例子，全国从解放到“文革”之前，各种运动对人才、文化的摧残，特别是“文革”的十年中，对人才，文化的迫害之巨大，应以天文数字来衡量了，这样大规模的摧残人也应该是空前绝后的。“文革”后有些人写了一些伤痕文学，文章表现了人对人的令人吃惊的残酷。自然会有人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哪些原因使其然？几名“四人帮”的罪恶不能概括全部根源。很多事情都要从“根”上说，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其实类似我们经历过的人，能有些基本的分析和理解，但我们的下一代及后人，你再怎么分析解释，他们都听不懂。就当说它是全世界的奇闻奇事，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吧。根据目前世界的发展，我相信今后全世界都不会有类似情况的再出现。以至于我想，再总结它分析它都没有必要。

回过头来，再讲一些“文革”中在“牛棚”中的小事。抓我到“牛棚”之前，三个孩子去年穿过的棉衣都很脏，我给它们拆洗了，但还没有缝上。到“牛棚”之后，我将此事告诉监视

者，并提到每个孩子只有一件棉衣，不缝上孩子将无冬衣。但遭到不予理睬和拒绝。这种无情，引起我心中的愤怒，当时我写过一段话：“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何狂虐？煎熬我心。忧从中来，难以斩断，家有三儿，身上无棉，北风拍窗，揉扭我肠”。寒衣的事引起我不断思念孩子。想起他们的小样子，更令我心神不安，我还写过一段话：“大儿捧饭常打箸，凝视观母，二儿扶母臂，后泪催前泪。三儿懂事否？呆呆木木客。稚女方四龄，已沐苦水中。”文革前我这几个孩子都比较懂事，三个人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读书，刚刚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品行好，读书也好。但这时文化大革命了，本来在学校和家庭的良好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文革”一来，父母突然都变成黑帮、叛徒……。成了阶级敌人。使孩子们不知所措。爸爸关在学校，后又下放农村。我家的宿舍门前墙上，用白粉子写着“自首变节份子卜毅”等大标语。这情况令已有点懂事的大儿子十分不解。所以每当几个人坐在一个小桌上吃饭时，大哥吃着吃着，筷子就停下来，用一种警惕和监视的目光看着我。他在想什么？我也不能问，因为无论什么我都无法回答。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是二儿子，这是一生中使我难忘的事。当我从“牛棚”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在一个小茶几前，我坐着，他站着，他扶着我的臂膀，陈述他们没有衣服穿的情况，他说：哥哥找不到衣服穿了，穿着爸爸的一件大单衣，站在院子中间，寒风吹来，他的大衣服飘来飘去，结语说“那样子，可z极了。”语不成声，泪流满面。所以有了“二儿扶母臂，后泪催前泪。”我三个孩子一冬天没有棉衣穿。三儿子从“文革”开始就没笑过了，总是呆呆的样子。小女四岁，院子里小朋友没人和她玩，像个小苦人，在外婆周围转来转去。真是个小苦人。

有人很不理解我的家庭境况。“文革”前我们二人的工资可以让家庭生活宽裕一些。但实际情况，我的三个孩子每人只有一件棉衣，拆洗时令我惊讶，这棉衣每年由老奶奶（老保姆）拆洗，后来说我家是黑帮不能让保姆伺候，给撵走了。当我把棉衣拆开时，我惊讶了，三个孩子的小衣服里都是一个个补丁，拆开后完全联不起来。当然是老奶奶十分节省的为我扶持家务。再说抄家时，从我家抄到了东西是一丈五的白布，原是准备换被里的，我自己家没个像样东西，我家的小存折子，上面可能只有一百多块钱，倒有一个二、三千元的存折是我婆婆带来的，折子上是她的名子，没有用过。总之抄半天，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倒是有一辆我自用的匈牙利自行车，北医来抄家的一男学生给骑走了。此人还要把一个无线电收音机拿走。我说别拿了，留给孩子听听新闻，了解点国内外大事，他还算不错没拿走。总之到我家想捞点外块，什么没捞着。令我伤心的事还有一件，在没进“牛棚”和从“牛棚”回来以后，我家在清晨和晚间常有“革命者”敲门查看，并做各种询问，当时家中只有我母女二人，真是相依为命，尤其是早晨，我小女尚未醒，敲门声，咚咚作响，进来后又惊诈一阵，小女儿在我怀中，微弱的发出嚶嚶的哭声，令我十分痛苦。我当时写了一小段，“长夜梦不来，辗转听无声，无声心最窄，有声又一惊。惊中小女儿，双手捧我颈。正得羽翼年，伤母勿伤女”。太难过了。

说个小笑话：我们在“牛棚”中的最大任务是认罪写检查。先说一下，我对检查的看法，我是最不会写检查的人，是有认识上的障碍，我就连“批评，自我批评”的作法，心中也有看法，尤其是解放后，我其基本上都是想投入全力搞生产建设，搞好经济，富强祖国。我所以总想上学，学理工科，就是这种思想。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没什么私心杂念。也许我以己度人。认为没什么大毛病，自己有点问题都能自己解决，不一定非要靠别人批评去解决，我是很少很少批评别人。提到自我批评，我自己想有些小毛病，自己知道也一定会改，用不着非到很多人面前，做什么自我批评。所以我既不愿意批评别人，也不会做自我批评。例如说我领着全院走“白专道路”，我基本认识不到，又怎么搞批评和检讨，所以我六四年检讨时总过不了关。在“牛棚”中给我戴的帽子，要做深刻的自我检查，我更做不到了。在牛棚除劳动外，就是坐在屋里写检查，桌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半支铅笔和数张白纸，当然为写检查使用。有时坐的又闷又累，我心生一计，用一片纸画了一个小围棋盘，我不太会下围棋，但我无事可做，想研究一下围棋怎么下。所以用画白圈和黑点各为一方，专心的研究起来了。我还特意的希望白圈战胜黑点，表示黑白世界的白的总要战胜黑的，因为我屡次声明，给我提的问题，我无法检查，现在监视者看我用心的低头在写什么，以为是写检查了，后来他悄然一视，非也，原来自己下围棋。于是

他们用广播的大喇叭向全体职工发话：“卜穀不悔过，不检查，竟然下起围棋来，真乃顽固到极点”。后来我又写了一段《白与黑》：“愁多亦不愁，夏多亦不夏。半段小铅笔，试来下围棋。白圈加黑点，黑白战酣急。白圈战术强，黑点即将惨。忽有狂声吼，顽固到极点。”

从66年到73年，我没有任何份内的工作，只有劳动。六年的劳动，开始是全体“牛群”搬石头，从院里面搬到北边，又从北搬到西，都是无效劳动，以示惩罚，搬了很久，可能感到有点不像话，就把我派去给司机们拆洗棉大衣，别人如何我不清楚。从拆到洗，到做好，大约做了十五、六件，没活了，又派到木工室，干小工。木工车间的老师傅虽然不和我说一句，但也从不呵斥我，我就默默的干一份工作，如打扫木屑，用大电锯，锯板材等，当没人时，有个老师傅，悄声告诉我：“小心手不要靠锯刀太近”。我很感激，“文革”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从木工室又到“红专工厂”，在机床上加工门把，看我会做点木工，又调到木工组，刨木板，锯木材，做木箱，这些过程我基本都学会了。后来大部分人下放到“干校”，职工每发了一堆木板，我也分了一份，职工干部，都找我去做，我挺高兴，我要试一下自己的手艺。我在宿舍里做了一个没有钉子，完全是笋事的木箱，方方正正，基本满意，后来估计因我问题严重，要继续审查，没有下放到干校，分配到幼儿园工作。那个箱子我用好多年。

到幼儿园，我是给园内孩子洗衣服，并到各班打扫教室。没有人和我交谈，只有大班王老师，她毫无顾忌的和我谈话，冬天孩子们做手工时，我们俩人围炉旁聊天。后来还有时帮她带班，给孩子们讲故事。虽然当时的环境已有变化，但仍是没人敢理我。王老师是当时唯一敢和我聊天的人。“文革”后我们当然成了好朋友，她是幼师毕业的，是幼儿园里唯一的幼儿教育专业人才，人耿直，敢发表个人意见，对幼儿教育很有水平。可惜文革后，不记得是那年她得了病，令人难过的是胃癌，故去，我们是能相互了解的朋友，但没有机会更多的相处。到73年我离开幼儿园回到设计院，干些业务工作。但我的问题尚未解决，直到七八年，才做了我的被捕没有问题，且在狱中表现是好的结论，这件公案才算了结。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